

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，不管在哪个阶段，它都控制着这个社会，对社会的主导思想，文学上不管是赞同、反对，或者是反抗，其实都是对它的承认。随着年龄增长和写作积累，我发现生活背景要大于这种社会背景，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，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好像一个人活下来，一辈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。”

《我叫刘跃进》写得又轻松又快。回过头写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原来遇到的结构问题也解决了。“再写的时候，特别的顺利，就好像这个两人谈话谈不下去，两人吃饭去了。然后吃完饭之后又各自聊下去了。”《我叫刘跃进》的好处是锻炼刘震云对结构的控制力和多线头叙述能力，在写作上真正成熟了。

以往的写作，刘震云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，他说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。就像登山一样，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，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。“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，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，但孔子的《论语》说的都是家长里短。”

2011年，刘震云离开《农民日



上图：一生都是文学青年。

报》，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。也是在这一年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让刘震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。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一样，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一日三秋》再次回到故乡延津。“我曾经说过，文学的底色是哲学。从此，我离开了家乡。后来，我和我的作品，又不断回到家乡。这时的回去，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。我想说的是，延津与延津的关系，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，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

系。换句话说，延津就是世界，世界就是延津。”在这个历史和时间跨度极大、结构和文体复杂的小说里，刘震云反而更气定神闲了，一个篇幅不长的小说，写了三代人的故事，时间的长度却跨越延津3000年历史，故事浓缩、人物生动、叙事老练写意。

对刘震云来说，延津既是故乡，也是世界。通过几十年的写作与思考，刘震云让故乡延津成为了一个文学世界里的地理标志，成为了家乡的文化符号和代言人。仔细算一下他写的小说字数，一大半都与故乡延津有关。

写了几十年，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远。

“我听了我舅舅的话，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。四十年前，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人人都在写作，我也跟着写，四十年后，全班同学都不写了，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写作。写作让人快乐，跑步也是，让人产生一种浑身特别舒畅的感觉，而且人在运动的时候，脑子特别活跃。”^[1]



左图：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一样，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一日三秋》再次回到故乡延津。